

陈启文小说创作艺术笔谈

陈 帅¹, 朱和锋²

(1.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2.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陈启文的长篇小说《河床》《石牌村女人》, 从文字肌理到人物塑造, 从叙事上的精心安排到主题上的深刻挖掘, 都体现了作家对于时代精神的深刻领悟。作者通过诗化或现实主义的写作来回溯、探究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 展现出作者对于不同类型小说的卓越驾驭能力。

[关键词] 陈启文; 文学诗意; 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6)06-0017-05

On Chen Qiwen's Novel Creation Art

CHEN Shuai¹, ZHU Hefeng²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 100875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expressions, characters, narratives and themes of Chen Qiwen's long novels *Riverbed* and *Women in Shipai Village* all reflect the writer'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e author explores people's mental condition with poetic and realistic writing, which shows the author's excellent ability to control different kinds of novels.

Key words: Chen Qiwen; literature poetry;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河床》: 文学的诗意到生命的诗意

陈 帅

《河床》^[1]风格独特而又充满艺术张力, 是一部不好把握的作品。整部小说由五个中篇组成, 互相独立而又筋骨相连, 彼此之间共同营造了谷花洲这一片水域独特的诗意空间, 展现了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厚重、复杂而又艰辛的精神成长史。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文本, 以一种精神回溯式的回顾, 探求了“故乡人”的精神本源, 以此, 从宏观的角度来探求人应拥有的生命的本源, 展现出生命“生而为蝼蚁如神”^[2]的诗意内涵。

本文从人物的诗意展现、叙事的诗意迷蒙和生命本源的诗意回溯三个层次来分析《河床》这部小说如何在文学的诗意中挖掘出生命的精神内核。

一 人物的诗意展现

《河床》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 五篇中篇分别以几个人物为核心进行回溯式的讲述和描写, 以此勾勒出整个家族的成长发展史。而这段历史从宏观的角度去看, 又展现了那一代人, 或者说, 整

收稿日期: 2016-10-18

作者简介: 陈 帅(1993-), 男, 陕西蒲城人,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学创作; 朱和锋(1991-), 男, 广东化州人, 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语文)。

个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作者无意于对这些前尘往事做悲情式的倾诉,而是在一种诗意的笔触中塑造出几个灵光闪闪的充满诗意的人物,而这些人物活动在谷花洲这一片美丽、静谧、充满朦胧美的水域空间,这些共同营造了小说的诗意氛围,而作者也正是在这种诗意美中表达了他对人在面对艰辛、含混、不可名状的命运时该作怎样抉择的深刻思考,也表达了作者对那些深深眷恋、怀念和内心深处所涌动的悲悯和感动。

在《河床》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分,亦即同名中篇《河床》中,作者充分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运用诡异多姿的笔触,描写了父亲天生神力、勇敢野性、刚猛霸蛮、粗犷简单的形象。其中父亲捕获虎皮鳞的场景、大家在江边立灶分事的场景犹如对《庄子·杂篇·外物》里,任公子为大钩巨缁钓得大鱼,大家分而食之的场景的现代版注解,张扬丰沛的想象力让这个细节诗意飞扬,让整个小说处于一种现实和梦幻的边界之中,朦胧魔幻,陌生多解,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父亲硬汉刚猛的形象也力透纸背。

此外,还有一些小细节,尽显作者用心,比如写小菊的单纯、可爱,没有用过多外在的笔墨,只是抓住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小菊用脚丫踩浪,那些浪花,踩一下就支楞起来,踩一下就支楞起来,一朵朵,像开粉的喇叭花。作者用充满诗意的笔触从浪花着手,反弹琵琶,描写了一个踩浪少女小菊美好的形象,而这种美好又和她后来迫于谣言的压力跳河自尽的悲惨命运形成张力十足的对比,让人唏嘘不已的同时,也给读者留下对于人性的思考空间。

《河床》中,林真老汉的存在是一种近乎神秘先知的存在,他一生之中守着大河,最后又被大河带走。传言无人收尸的他,自己用灵魂把自己的肉身背入墓穴。作者以诗意的想象来表达林真老汉用最纯粹的内在来救赎自己最苦痛的肉身的深层内涵。《闪电中的鸳鸯》里,春仔在河道捡了一颗石子,用潘天火送给他的弹弓对着天上的云射去,雨就哗啦啦地下来了,儿童的视角,天真的童趣,这种诗意思想的亮点在这部小说里比比皆是。春仔的姑姑在月光下跳入河中洗澡,水洁净清澈,人素净灵动,人与景交相辉映,展现出一副让人迷醉的月下沐浴图,就像圣女的悄然降临,让人引发心中无限美好的想象,作者笔到意成,诗意的氛围,迷醉的画面,让小说尽显诗意的美感。《桃花水母》中,春仔的大娘最后杳无音讯,化作了河中的桃花水母,

作表以此作为其历尽苦难却心存善念的诗意注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用诗意的笔触,展现异于现实的景致氛围,描写异于常人的角色人物,都是想在一切美好中展现出人无可奈何的一面,展现出人苦痛挣扎的一面,而这种美与痛的撕裂,让整部小说的人物张力十足,也让小说的意义空间展开无限的延宕,让读者久久沉浸其中,回味绵长。

二 叙事的诗意迷蒙

《河床》整部小说的语言和叙事都很注重写意性,这种写意主要是指其在处理乡土题材的小说时,没有用浊重、粗粝的言语表达,也没用封闭、线性的叙述叙事,而是选择用一种梦幻、迷蒙、散文性和抒情性并存的语言和“反结构”“双自我”的叙事策略让整部小说建构在真实和虚构之间,而文本意义在两者之间的不确定指涉就使得小说文本的写意性凸显,而这种写意性正是小说诗意的体现。

一部小说的优劣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叙事上,叙事是否有个性,有腔调,是否能极大地为小说内容的表达来服务,是衡量其小说是否成功、叙事是否到位的唯一标杆。在《河床》中,作为一位一直不愿被先锋文学标签所定义的先锋文学作家,陈启文用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的理解,创造性地在小说中使用了“反结构”的叙事策略。这种“反结构”体现在整部小说很难看出其明显的结构,但却又彼此筋脉相连、浑然一体。整部小说由五篇中篇小说组成,每篇中篇小说在内容上彼此独立,但是在人物谱系上又彼此勾连,在这样的叙事策略中完成了一部家族叙事。这种家族叙事不同于《白鹿原》那种时间连贯、脉络清晰的家族发展式叙事,而是一种时间错乱、人物彼此交杂的跳跃性、拼凑性、互文性家族叙事。作为主人公的春仔在有的部分是小孩的存在,而在有的部分却拥有成年人的视角,由此可见,在这里时间已经失去了界限,唯一的叙事标准就是以主要人物为核心,其他的所有人物和时间都在这一部分里为这个人物所统摄。《闪电中的鸳鸯》里的姑姑,《桃花水母》里的大娘,都是这样的统摄性人物,而到了其他部分,姑姑和大娘又成了其他人物的陪衬。这种重点突出、彼此互文的写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史记》里面“互见法”的叙事创举。而作者这种实验性的叙事策略,并没有让整个故事支离破碎,而是更加的紧凑、突出。

陈启文生活在洞庭湖平原,那里的村落“随地

赋形”本就寥无章法,一切顺遂自然,这样的生活状态毋庸置疑影响了陈启文的小说创作,看似实验性的小说结构,更像“无招胜有招”的鬼手点化,这里与其说是“反结构”,还不如说是他效法自然、回归文学本性的风格体现。生活原本就没有结构,这部小说的“反结构”特征,也就展现了作者让文学回到生活的原生状态的想法和初衷,也正是这种“反结构”,原生态的处理让整部小说不可名状而又浑然一体,在不可名状中凸显诗意,在浑然一体中直抵文本的内涵深意。

在《河床》这部小说中,除了明显的“反结构”特征,其文本叙事形式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特色,那就是“双自我”的叙事声音,小说文本里面有两个叙事主体的“我”存在。一个“我”是外在的,是活动在小说里面的“春仔”,是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谷花洲一切变化,谷花洲的人一切心酸变故的我。另一个“我”,是内在的、隐藏的、不为人所察觉的“我”,这个“我”就是作者自己。这两个“我”在小说叙事中交叉出现,彼此互文补充,构成一种复义性叙事,展现了感觉的世界和观念的世界的双重空间,实现了具象和抽象的彼此映现,前者在于展现,而后者在于阐释,这种内外贯通的互文表达,让小说的意义空间大大提升,造成了陌生化的阐释效果,也实现了小说写意性亦即诗意的文本表达。

三 生命本源的诗意回溯

米兰·昆德拉在其学术著作《小说的艺术》中曾指出“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做到的”,^[3]陈启文在《河床》中以谷花洲为创作的精神源地,他把谷花洲写得那么的美,这种美是人类原生态环境的野性美,是作者心灵向往的梦幻天堂,他无意于仅仅展示这种乡土美,这里乡土美只是一种符号、一个象征或者载体,他的真正目的是在这种美中指涉人的存在环境和对人的精神追问上,寻找出环境的“美”和人的存在的“痛”和精神的“痛”之间的桥梁。而在这种追问和挖掘中,作者无心于泪流满面的控诉或指责什么,而是用足够美、足够诗意的一切外在表征展现出他所领悟到的人之存在的生命本源上的意义,作者在这种生命本源的诗意回溯中所得到的答案就是回归且保守人的本性的美好,世界几多苦痛无奈,人都不能改变,人所能决定的就是坚信信仰,即使生如蝼蚁,也要活出神一样美的姿态。

在《河床》这部小说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崇尚一切自然美和野性美,所有的人生养于大河,也试图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和大河去搏斗(《河床》中,人们对于洪灾的反应)。他们对厄运的降临无可奈何,但他们绝不甘于屈服于命运,而是竭尽全力,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展现自己所不知的神的光辉。林真老汉一辈子就像一个自然的守护神,即使最后小菊的跳水自尽使得他善念破灭,他也依然持守着对自然的信仰,困守于自己亲手建造的树巢中,搏击一切而又坦然地接受一切,他不为自己失去生命而可惜,他只为自己实现灵魂的坚守而欣慰。“春仔”的姑姑,沐浴着月光的纯洁少女,她抱着生命的幻想咀嚼命运的草率安排而下定决心和潘天火私奔,而当潘天火提出为了吃饭的“家伙什”重返村庄时,姑姑一瞬间看透了这个男人,她之前对他的所有幻想,关于一个成熟男人所应有的野性、力量、担当的品质的幻想,一瞬间崩塌。她选择重回村庄接受命运的安排,即使最后因为私奔而寡居终生,生下残疾儿子而受尽折磨她也没有后悔。这里面,姑姑那种坦然接受、永不屈服的精神操守让读者能从心底感受到人之所以作为人、存在的那种韧性、尊严和伟大。姑姑是那样一个美的存在,而她的一切表现和悲惨遭遇让这种存在上升到诗的悲剧美的空间。而在《桃花水母》这一篇章,大娘这一角色更是让人心生感动,她一辈子持有着美好的人性底色,尽心尽力地照顾心情郁结、多病多难的大伯,把余县长一手抚养长大,对于其背弃情意般的寡淡态度并不计较,又一手抚养大“我”这个养子,为了“我”的工作而去求余县长。在我们都长大成人远离大娘后,她又一次把自己真诚而又纯粹的爱毫无保留地付出在一个入室抢劫的小偷身上,用自己的一片真情感化小偷并收为养子。最后在村支书叶四海和养子“余县长”的共同摧残下,大娘失去了她的养子,并被孤独地送进养老院。而一辈子经历各种大风大浪总是以爱化解的大娘绝不轻易屈服于命运,这次她选择回到大河的怀抱里,化作一只桃花水母,用一个最好的梦作为一生最诗意的注脚。

《河床》无疑是陈启文作品中内容和形式结合臻于完美的一部代表作,作者无心于在小说中控诉什么或强行表达什么,一切都以诗意美开始,又以诗意美结束。语言的诗意考究,人物的诗化美好,叙事的诗味迷漫,让整个小说文本充满诗意,展现着文学的诗意美。而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诗意

表达的外在表征下,作者试图从生命本源上去探求人诗意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被作者赋予了其他作品少有的深刻内涵和感人力量,让读者感受到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让读者领略并意识到人所应该存在的行动方向。

都市的喧嚣与精神的坚守

——读陈启文小说《石牌村女人》

朱和锋

乡村和都市文明的断裂,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逃离乡土,奔赴现代化的大都市寻求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以满足物质上的追求以及精神上的自我。对未知世界充满着无限想象和美好期待的年轻人,初次踏上现代化的大都市,在都市文明的熏陶下,他们在逐渐实现着一种内心的蜕变,告别出发前的一整套稳固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评判,习惯于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生活,开始形成一套新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然而,现代化的大都市没有给他们提供理想的精神家园,抑或个人的实力不足以支撑内心的梦想,许多人抵抗不住诱惑,被都市的声色物欲所攻陷,仅有少数人保持着清醒,在都市的灯影之下艰难而孤独地坚守着精神的领地。当前有不少作家热衷于揭露、抨击现代都市文明的丑恶,极力描述人们生活的悲惨遭遇,而很少有人能正视都市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对他们,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同情,不是救赎,而是必要的正视和尊重。他们从来就不需要救赎。需要救赎的可能是这个社会的另一些人,甚至就是这个社会”。^[1]一部好的小说,既能充分暴露社会的丑恶,展现人们生存的真实状态,揭示人们的内心真实,又能鼓舞人们勇敢面对生存的困境,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

基于这个视角,陈启文的中篇小说《石牌村女人》便体现出了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篇小说萌生于21世纪之初经济大发展的宏大背景,通过一名内地高校毕业生祝敏的经历和遭遇,以及对一个个如华姐、姚娜、区一民、阿伦等人物形象的刻画,真实地再现了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和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并借此审视了现代化大都市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暴露的冲突与矛盾,以及在这一矛盾中体现的人性遭遇与命运抉择。

陈启文的小小说直击都市社会生活的真相以及

参考文献:

- [1] 陈启文. 河床[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 [2] 顾城. 生如蚁美如神[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6.
- [3]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7.

人物的历史命运,对女性遭遇的不幸感同身受,同时给予深切的关怀与极高的尊重。小说开篇叙述的却是“我”在广州许久之后的一个清晨。“我”刚起床就被蜜蜂蛰了一下,并迅速地肿胀起来,可是,“美丽对一个女人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对我这样的女孩,美丽是生活下去的全部根据”。^{[2]129}这本身就带着某隐喻的性质,有时候不管有意或者无意,麻烦都会找上门,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错就可以避免麻烦的发生,再美丽的脸盘也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再幸福的人生也可能遭受意外的打击甚至破坏。无论是刚开始找工作时“我”所遭遇的挫折,还是被骗拐至色情场所,还是后来与区一民的相遇,都无一例外地呈现着基本的历史真实,同时吸引我们去探寻小说丰富而深刻的意义世界。主人公的遭遇,是个人命运的偶然性发生,还是整个时代的必然经过,我们不得而知。虽然这种历史真实给我们以深深的无奈甚至荒诞之感,我们仍要承认而不是否定这样的历史存在。

小说《石牌村女人》构建了一连串的人物关系,借助一个个具有丰富个性的人物角色,很好地诠释了都市生活中人们的生活联系以及内心的关联,揭示了冲突的直接原因。小说里的角色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位女性的生活都至少有一位男性的参与,如“我与区一民”,“华姐与老头、阿伦”,“姚娜与情人、孩子”。小说里的男性角色,不仅是这些都市女性生活的配角,作者思想意图呈现的辅助,而且是这些女性命运的参与者与不幸的制造者。“我”留在区一民身边,钱和工作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华姐“爱着”八十多岁的老头,无非是为了钱和房产;姚娜为了让情人回心转意,残酷地将自己和肚里的孩子躲藏在地下室半年之久。这些女性无疑是希望借助男性为自己的幸福生活铺路,她们的

不幸遭遇似乎又是个人自觉选择的结果。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她们,殊不知,男性才是造成这些都市女性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区一民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商界成功人士,却不能让“我”感到实在的依靠,无法令“我”看到未来;艺术家老头给了华姐一个虚假的承诺,而这个“承诺”却被一场突如其来暴风雨彻底击碎;孩子的“喧嚣”声之中,姚娜得到的只有电话另一头“父亲”永远的沉默。作者通过女性的视角来察视男性,又以男性映照女性本身,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艺术性,丰富和加深了小说的思想意蕴。

在小说《石碑村女人》中,“石碑”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遗留,又与都市现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石碑是一座贞洁牌坊,纪念的却是一个卖身的妓女”,^{[2]133}它似乎是这些女性的向往,却又不肯相信石碑的贞洁,毕竟各自做着类似教坊里的事情。石碑将小说中的不同人物联系在一起,故事的发生也是围绕着石碑村展开。石碑村是“我”、华姐、姚娜等人暂时的居留地,“石碑”象征着这些女性的理想,是都市冷酷环境下的一点温存所在,更是姚娜仅有的精神寄托。“一个女人就靠着那座石碑坐着,脸白得几乎无法同着白白的石头分开,头发上闪烁着幽暗的光泽”,^{[2]133}“我”一次次地在这座牌坊下遇见姚娜,而每次都让我感到十分恐惧。“你发现没有,这座牌坊有点歪了呢”;^{[2]134}“又异常神秘地告诉我,这座牌坊真的有点歪了,你仔细看看”;^{[2]148}“那座牌坊真要倒了啊”;^{[2]148}“它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最终还是没能扛住这场罕见的龙卷风,它倒了”。^{[2]154}女人的生存一开始就依存于这座石碑,女人的命运也如这座石碑一般,出现裂缝,变得歪斜,正在流血,在灾难中倒塌。一切的感性最终都要回归理性,一切的理性又都建立在感性之上。假如没有出现这座“石碑”的出现,我们关注的只不过是几个都市的外乡女人,然而“石碑”的出现与反复出现,促使我们更深层次地进行思考,贞洁又是什么?在这些女性的眼中,恐怕贞洁早已经失去了说服力,“石碑”也丧失了它原有的地位。

陈启文在十多年的创作中,非常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命运遭遇。他笔下的诸多女性,大多在都市文明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跋涉、对抗。在构思人物命运的过程中,陈启文“不停地在寻找女性意识的

内涵与特质,有时还表现出令人难以琢磨的犹豫和矛盾”,^{[3]301}既抨击女性过度的欲望,又极力去满足她们的生活欲求,张扬人们的自然天性,展现了都市人们生存的尴尬境况以及内心的困扰。“女性们的生活都不是处在自己向往的如意中,她们一个个都是困惑者或孤独者,种种努力都无法排除个人内心的困惑和孤独。这种希望与失望的交织,寻找与挫折的同在,却恰恰显示了女性生存的尴尬和艰难”,^[3]这也是陈启文最为关注和担心的。然而,在《石碑村女人》中,不少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我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相似的气味”,^{[2]149}连嗅觉灵敏的狗鼻子都经常弄错,但“我”总是“把自己和她们严格区分开来”,^{[2]113}依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主人公在“茫然无措”的时刻,也会将生命、希望、恐惧等寄托于不可预知的未来,等待奇迹的出现。可是,每到关键的时刻,“我心底里就有一种关键的东西开始起作用”。^{[2]143}最终,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的“牌坊”在这场飓风之下绝望地倒了下来,仿佛石碑村的女人都失去了心中的依靠,然而,在姚娜的声声叫唤中,“我突然对生命有了一种很尖锐的感觉,它破空而来,凛然不可侵犯,也没有什么可以抵挡住它”,^{[2]153}新生命的诞生以及这种“关键的东西”一直支撑着“我”的精神世界,使我在绝望与希望的循环往复中孤独地坚守。

《石碑村女人》并非简单、消遣式的都市生活记或女性故事,而是在都市文明的畸形裂变中揭示生活的本质和真相,在喧嚣的和宁静的二元对立中对女性的精神世界进行探寻,力求真实地再现都市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态,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发展进行解构和反思。处在这一文明发展之下的女性群体,无论是沦陷还是坚守,都发出了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呼唤现实与未来。

参考文献:

- [1] 陈启文.创作谈:一个人的南方经验[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2):64.
- [2] 陈启文.石碑村女人[J].红岩,2005(4).
- [3] 张惠芳.试析池莉小说中女性的自我救赎[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

责任编辑:黄声波